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與帝俄漢學

S.M.Georgievsky and Russian Sinology

閻國棟 (Yan Guodong) *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 ¹ 是俄國漢學史上一位很有分量的人物。他通古博今，才華橫溢，雖然英年早逝，但卻為俄國漢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短暫的一生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全名為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格奧爾基耶夫斯基，1851年出生在俄國科斯特羅馬 (Кострома) 的一個神父家庭，1861年8月進入科斯特羅馬中學學習，1868年以全科5分的優異成績畢業。他不僅在學習上極有天賦，而且品行端正，因而被校方授予金質獎章。中學畢業後，格奧爾基耶夫斯基進入莫斯科大學歷史語文系學習，畢業時獲得候補博士學位。² 他先是在科斯特羅馬實科中學做了兩年俄語與歷史教師，而後由於對省級教師的地位和微薄薪水感到不滿，決定改學漢語，期望以此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他當時相信，掌握這樣一種艱深的語言不僅可以擴展他的中國知識，而且還有可能去遊歷這個他在莫斯科大學期間就已經耳熟能詳的國家。關於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為何突然決定去學習漢語，也有人說是受到了當時在莫斯科大學任

教的著名東方學家彼得羅夫 (П. Я. Петров, 1814-1875) 的影響。彼得羅夫通梵文、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東方文字，也曾學習過漢語，是當時學術界很有影響的人物。他先在莫斯科大學語文專業畢業，後又到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學習。尊重東方文化是彼得羅夫的最大特點，他甚至從不將東方語言與其他語言進行對比研究，而是將其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他博學多才，自稱收藏有100多種語言的書籍。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期間，經常去聽彼得羅夫教授的課。從格奧爾基耶夫斯基與彼得羅夫極其相似的求學道路和治學風格來看，這種看法還是有一定根據的。

1875年格奧爾基耶夫斯基來到俄國東方學教育的中心——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作為漢滿語專業一年級的學生，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寫給好友斯維爾別耶夫 (А. Д. Свѣрбѣев, 1835-1917) ³ 的信中描繪了他在東方系最初的學習生活，對我們瞭解19世紀後期俄國漢學教育狀況很有參考價值。他在信中依次描繪了聖彼得堡大學3位著名教授，惟妙惟肖，非常生動。他寫到：「第一堂課。格里高里耶夫⁴走進教室，坐到講臺上，然後開始說：『先生們，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是來學習東方語言嗎？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非常難；想在未來為自

* 作者係南開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教授。

1 中國史籍中稱之為「格倭爾兒耶甫司克」。參見蔡鴻生著，《俄羅斯館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22。

2 俄羅斯自1819年起實施統一的學位授予制度，從低到高依次為候補博士、碩士、博士。1884年取消候補博士學位，只保留碩士與博士兩級。1917年蘇俄人民委員會廢止碩士與博士學位授予制度。1934年恢復學位制度，有副博士與博士兩級，蘇聯時期一直沿用。自1992年起採用世界通行的學位制度，分別為學士、碩士、博士。

3 出生於莫斯科貴族家庭。1856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1878年為薩馬拉 (Самара) 省省長，此前擔任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家鄉科斯特羅馬省副省長。

4 В. В. Григорьев (1816-1881)，俄國東方歷史學家，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

己在外交部謀一個職位？你們錯打了算盤，謀一個職位談何容易；你們想拿著獎學金舒舒服服地過大學生活？你們沒有什麼獎學金，什麼也得不到。趕快到其他系去，到其他學校去，這裏不僅學習非常難，而且出路也難……」第二天來的是漢語教授佩休羅夫（Д. А. Пешуров, 1833-1913），對學生講的還是那番理論：『先生們，你們對將要做的事情考慮好了嗎？因為你們要學習的語言既無語法，又無字母，只有一個嚴酷的事實，就是它擁有 4 萬個象形文字。現在還來得及，到其他地方去學其他專業吧。』經過兩位老師的如此警告，本來有 8 名學生，現在只剩了 4 名……」我們從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信中可以得到這樣的啓示：首先，19 世紀 70 年代，俄國政府部門對漢語人才的需求不大。其次，大部分學生進入東方學系學習的目的不是爲了科學，而是爲了將來能在政府機關謀一體面的職業，好過上衣食無慮的生活。第三，東方系的教授們開門見山地對學生學習漢語大潑冷水，除了向學生介紹俄國漢學學科現狀以外，也充分估計到了漢學道路之艱難困苦，以便將意志薄弱者或追求仕途者「嚇跑」，提前淨化漢學隊伍。與前兩位正言厲色的教授不同，19 世紀下半期俄國漢學的領軍人物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的形象顯然更加令人親近，所講的話更加耐人尋味。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信中給瓦西里耶夫繪製了一幅素描：「瓦西里耶夫來了，氣宇軒昂的老者，他這樣說：『先生們，你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但話說回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如果不得要領，都會很難。正確的方法和優良的體系能使任何困難降到 minimum。如果遇上糟糕的老師來教，漢語很難，而且是無以復加的難；我有一個學生，他只學了一年，漢語水平就達到了可以不借助詞典而閱讀任何書籍的程度。』接著，他向學生介紹了學習漢語在學術上的重要性以及其他方面的意義……」而對於自己的漢語學習，格奧爾基耶夫斯基這樣寫到：「總的來說很難。對於一個新手確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些漢字，你是一邊死記，一邊遺

忘；今天你背會了 20 來個，等到明天檢查，剩下的就不是 20 來個了，而只有 2 個……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我總算進入了角色：連續不斷的演練以及瓦西里耶夫對漢字的分析發揮了作用，目前能記住漢字不是因爲漢字的形象進入了你的視網膜，而是由於構成漢字的各個部分反映了漢字的歷史並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它的意義——概念，一句話，可以理解了。關於衆所皆知的漢語沒有語法的說法現在我也有了相當確定的理解：語法是有，而且是最規範、最清楚的語法，只是沒有形式的變化和詞類的劃分；產生這一切的原因在於歐洲人的判斷基於他們對於歐洲語言和西亞語言的認識。」⁵

1880 年，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從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畢業。他旋即進入了莫斯科的一家叫做「波特金及其子孫」⁶（Боткин и сыновья）的貿易公司。這是一家與中國進行茶葉貿易的俄國商行，因業務所需，他於次年派到中國。到 1882 年回國，期間他到過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張家口和福州等地。時任俄國駐上海領事的帕捷林（И. В. Падерин）在寫給俄國駐華使館翻譯柏百福（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的一封信中，紀錄了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到上海時的情況：「他在上海待了一周，我們沒有見到他。這位先生在莫斯科大学和聖彼得堡大學學習過。在聖彼得堡大學上的是東方系。他完成了兩個大學的學業。聽說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可以非常流利地用漢語閱讀和交談。是波特金家族介紹他來漢口的，目的是爲了學習生意，如果不行，則學習漢語。這是個全新的現象……在漢口等地，特別是在福州，商人們在依靠自己半通不通的漢語經營。再者，一家大公司有一位認真的商人懂得這個國家的語言，並且能夠用智慧的雙眼審視俄國人在中國的貿易，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很少有人經商，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是個例外。」⁷ 帕捷林的信爲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儘管俄國外交部等部門職位有限，而俄國商界還是非常需要漢語翻譯人才的。帕捷林的信同時也說明，替貿易公司做翻譯工作對於漢語專業學生的吸

5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信轉引自 Хохлов А. Н.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еда // 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94.

6 波特金家族創辦的商行是 19 世紀末從事中俄茶葉貿易的主要俄國公司之一。

7 轉引自 Хохлов А. Н.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еда // 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94.

引力似乎並不大。

一年後，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回到了俄羅斯，放棄了茶葉公司的工作，再次進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1885年，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抱病完成了題為《先秦史》（*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Д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Цин-ши Хуанди*）的碩士論文，11月10日順利通過了答辯。當時的論文評閱人中有瓦西里耶夫教授和俄國著名蒙古學家波茲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 1851-1920）教授。聖彼得堡的一張報紙曾經就此寫到：「他在自己的論文中證明，歐洲人以及中國人自己敘述的中國古代歷史不是完全可信的，只有在找到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實物之後才能令人信服。」⁸ 這句評論雖看似簡單，卻是19世紀下半期瓦西里耶夫、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等人將俄國漢學在研究方法上引向近代化的體現。1886年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成為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編外副教授並開始為學生授課。他為一年級學生講授漢語及文字的基本特點，介紹中國的政治體制。為二年級講授《四書》的閱讀和翻譯，分析早期儒學的本質。為三年級講授新儒學的特點，翻譯《性理精義》。利用《古文淵鑑》為四年級學生開設鍛煉古文翻譯能力的課程，講授司馬遷和王安石的生平及活動。⁹ 此外，格奧爾基耶夫斯基還為二年級和四年級學生開設了「中國歷史事件」課。瓦西里耶夫的佛學課和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有關中國儒學的課程比較系統地向學生傳授了中國的哲學思想。3年後，他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題為《對反映古代中國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Анализ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цев, как отражающей в себе историю жизн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1890年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39歲時成為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漢語教授。1893年，他出國收集道教研究資料，遍訪倫敦、巴黎和柏林各大圖書館。在回國途

中，不幸於7月26日因病於法國的梅茨（Metz）猝然去世。在《家庭》（*Семья*）雜誌刊登的一則悼文中寫到：「繁重的工作摧垮了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身體。今年3月他出國，計劃在威斯巴登¹⁰治療，同時到倫敦、巴黎和柏林研究與道教相關的問題，但卻在梅茨英年早逝。」¹¹

二、傑出的貢獻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於中國傳統文化領域，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為俄國漢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留給後世幾部重要的漢學著作。第一部是他的碩士論文《先秦史》，1885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這是俄國漢學史上第一部論述秦始皇之前中國歷史的力作。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充分研究中國文獻的基礎上，對西元前的中國歷史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因為此書一反流行於西方的歐洲中心論歷史觀，出版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批評和讚譽相伴而來。波茲涅耶夫稱之為「俄羅斯東方文獻最令人興奮的現象」，並列數了格氏著作的優點：比前人梅輝立（W. F. Mayers, 1831-1878）、杜赫德（J.B.Du Halde, 1674-1743）、鮑吉耶（M. G. Pau-thier, 1801-1873）等歐洲漢學家著作的資料更加豐富，對年代問題認真關注，明智地刪節了各種征戰細節，從保持歷史真實的角度果斷省略了人物不可靠的對話和獨白，考證了歷史地名的現代名稱等等。而蘇聯漢學家尼基福羅夫（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1920-1990）則視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是「俄國第一個真正的中國歷史專家。」他認為「俄國首位職業歷史學家的出現，是中國歷史研究從漢學學科中進一步分化和獨立的標誌。」¹²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第二部著作是出版於1888年的《中國的生活原則》（*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全書分為12章，介紹了中國的靈魂不滅、祖先祭祀、

8 轉引自 Хохлов А. Н.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ода // 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94.

9 參見 Петров В. В.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 Точность-поэзия науки: Памяти Виктор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Петрова: Сб. ст. 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2. С.22-23.

10 德國城市。

11 轉引自 Хохлов А. Н.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ода // 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94.

12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Наука, 1970, С.15.

長幼禮序、多神宗教、儒家學說等中國文化思想和現象，其中儒家學說佔去了5章的篇幅。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前言中道出了寫作該書的動機：「俄羅斯民衆對中國的認識非常模糊，並不瞭解瓦西里耶夫教授雅俗共賞的著作（《東方的宗教：儒、釋、道》、¹³《中國文學史綱要》¹⁴）（更不用說比丘林的著作了）。」他認為歐洲已經出版了許多論述，介紹中國的民情和風俗，但「不管這些細枝末節的問題多麼有趣，我們認為都是次要的。我們首先應該認清構成天朝大國子民生活基礎的原則。」¹⁵此書出版後引起的反響更大，報紙和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書評。聖彼得堡大學教授維謝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 1848-1918）認為這是研究亞洲民族祖先崇拜最好的著作。1887年，清朝戶部主事繆佑孫出使俄國，在其回國後撰寫的《俄遊彙編》卷8中記載了1888年3月27日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向他贈書的情況：「偕余威烈甫¹⁶訪俄之華文塾師瓦西理，¹⁷又同訪格倭爾兒耶甫司克，其人能通十餘國文字，曾遊歐、亞二洲，在華數年。博覽中國書籍，能曉其大義。贈所著譯中學書一巨冊，極稱綱常大義為中國根本，又旁及古載籍，所讀書則五經、四書、家語、老墨莊列、國策、國語、資治通鑑、三國志、路史、關裏、文獻考、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淵鑑類函、陔餘叢考、五禮通考、顏氏家訓、溫公家範、文公家禮、歷代名臣奏議、古文淵鑑、經義考、毛西河全集諸書，頗知考證古事，篤信孔孟。談次謂中國開闢最早，至今能守舊制，歐洲諸國所不及也。」¹⁸格奧爾基耶夫斯基贈送給繆佑孫的「中學書」就是《中國的生活原則》，格氏在書後漢字注釋中列舉了他所參考過的中國古典文獻書名，繆佑孫日記所列書目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第

三部著作《中國人的神話觀和神話》（*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出版於1892年。該作是俄國歷史上第一部論述中國神話的著作，他也因此而成為國際漢學界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鼻祖。他認為，中國有許多涉及神話的書，但內容大都支離破碎，相互矛盾，有必要進行全面的梳理和系統的研究。¹⁹他撰寫此書所依據的文獻主要有《尚書》、《詩經》、《禮記》、《搜神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和《三才圖會》等。按照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 1932-）先生的研究，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在書中主要研究了中國人的神話觀念及其演化過程，依次介紹了混沌開闢、陰陽理論、五行、自然的「天」概念演變為「天帝」等觀念。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用一章的篇幅論述中國的星宿神話，分析了中國人觀念中天地之間事物對等存在的思想，分別介紹了太陽神話（羲和、後羿）和月亮神話（嫦娥、吳剛、玉兔、蟾蜍等）。在其他章節中還談到了與自然現象（隕星、雷、虹等）及動植物相關的神話觀念，介紹了中國人崇奉的形形色色的守護神，如竈王爺、各種娘娘等。最後一章專論遠古時期的帝王。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斷言伏羲、神農、黃帝、帝嚳、堯、舜等帝王形象，都是在神話觀念的基礎上形成於民間的神話形象，後來被孔子加工塑造成了垂範後世的理想帝王。²⁰

此外，格氏在漢語研究上也頗有心得，除了作為博士論文的《對反映古代中國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外，他還於1888年出版了《漢語的根本結構和中國人的起源問題》（*О корневом состав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итайцев*）。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生活的時代，正是漢學分科開始

13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Пб., 1873.

14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1880.

15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СПб., 1888. С. XIX.

16 即舍維廖夫（М. Г. Шевелев, ?-1903），漢語翻譯，商人。1861年畢業於恰克圖翻譯學校，做過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翻譯，後到漢口經商。參加過中俄「北京條約」和「璦琿條約」的簽署，1886年璦琿勘界時作為翻譯曾與清朝的吳大澂談判。

17 即瓦西裏耶夫。

18 轉引自蔡鴻生著，《俄羅斯館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22-123。

19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Пб., 1892. С. XI.

20 參見〔蘇〕李福清著、田大畏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小說、戲曲》（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頁5-6。

的重要時期。從「西方學」到「東方學」的求學經歷以及善於思考的個性使他很快就發現了俄國漢學所面臨的危機。他力圖為漢學研究確定明確的目的。他指出，漢學家應該幫助社會樹立對中國民衆的新看法。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衆多的國家，它同我們的友誼將來可以保障全世界的和平，造福地球上的一切種族和民族。」²¹他同時認為，無論是俄國的還是歐洲的漢學發展狀況，都不能適應現實提出的任務。「作為一門完整的學科來說，漢學還不存在，因為它沒有明確的目的，沒有牢固的基礎，也沒有成熟的研究方法；漢學依然同單純的翻譯混為一談，同將漢語譯成某種歐洲語言的技巧視作一回事。」「漢學不應當被看作是一種科學，而應當看成是多種科學的綜合。」²²他為漢學指出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這就是對漢學進行分科研究，從而實現俄國漢學的近代化。儘管如此，我們似乎不應將為俄國漢學指明道路的桂冠，只戴到格奧爾基耶夫斯基一個人頭上。俄國漢學家米亞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 1931-）說：「在 19 世紀下半期俄國的傑出漢學家中，卡法羅夫和瓦西里耶夫佔有特別的地位。他們各自為漢學研究的不同領域注入了新的內容，同時攀登到了世界東方學所取得的有關中國全部知識的最高峰。正是他們的著作為我國漢學的分科奠定了基礎，產生了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思想史這樣一些研究方向，創造出綜合性的研究著作，將中國歷史史料學分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²³因此，俄國漢學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開始分科進程，既是一代俄國漢學家努力的結果，也是近代東方學科發展的必然走向。蔡鴻生先生對 19 世紀下半期

俄國漢學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如果說，俾丘林²⁴曾使俄國漢學民族化，那麼，王西裏²⁵則從理論上和 method 上把它近代化了。」²⁶

三、崇尚中國傳統文化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是瓦西里耶夫的親傳弟子，在接受老師思想的同時，在許多問題的認識上與老師的觀點相左，成為瓦西里耶夫「樂章」中的不和諧「音符」。

在反對歐洲中心論方面師徒間的觀點還是基本一致的。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繼承了瓦西里耶夫的思想，反對諸如認為中國停滯不前等貶低中國的言論。他在 1890 年出版的《研究中國的重要性》（*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一書中寫到：「有哪個讀者不知道『漢學』一詞？一提到中國，人們就會產生因循守舊、裹足不前的想像。中國就是麻木不仁的代名詞，這種觀念在中學時代就被根深蒂固地灌輸到每個人的頭腦中。人們帶著這種觀念進入生活，通過閱讀書刊和與周圍的人交流使其進一步加深。中國是一個停滯的國度像一個無可辯駁的模式被大家所接受。人們關於中國停滯的印象均非出自自身的判斷，而是模仿別人，盲目相信。在漢學領域以專著取得知名度的學者的言論。」²⁷他認為「一些漢學家有關中國是靜止的代名詞的看法正好迎合了歐洲人的口味。沒有競爭對手使歐洲人變得自命不凡，歐洲的哲學家更是如此。他們無所顧忌地使用歷史資料佐證其武斷的結論。」²⁸在這本書中，格奧爾基耶夫斯基一反當時盛行的觀點，指出中國並非停滯不前，而是一個活生生

21 轉引自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4. No 2.

22 轉引自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4. No 2.

23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и Ипатова А. С.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до 1917 года), 未刊稿（2001 年冬該文作者之一 Ипатова А. С 在北京贈送給筆者）

24 即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

25 即瓦西里耶夫。

26 蔡鴻生著，《俄羅斯館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82。

27 轉引自 Горбачева З.И., Пертов Н.Н., Смыкалов Г.Ф.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ерия 2. М.: Наука, 1956.

28 轉引自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Наука, 1977. С. 232.

的肌體，是一個正在取得進步和政治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國家。像瓦西里耶夫一樣，他相信中國有光明的未來。他還寫到：「我們確信中國將不斷進步，實力將進一步增強。我們不僅不允許中國被西方或美國長期統治，而且確信將來世界上政治強國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都要考慮俄中兩個相互奉行和平友好政策國家的意見。」²⁹中俄兩個偉大的民族要友好相處是俄國大部分漢學家的願望。格奧爾基耶夫斯基進一步論證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希望俄國民衆「拋棄毫無根據的成見，用新的目光看待中國人民。」³⁰

但是，在許多問題上，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觀點與瓦西里耶夫有很大差距，有時甚至相互對立。比如，瓦西里耶夫認為孔孟思想是導致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則認為儒學恰恰是中國進步與發展的動力所在，「極稱綱常大義為中國根本」。他不遺餘力地批判流行於西方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調，極力推崇中國獨特的歷史與文化。瓦西里耶夫認為中國人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族，而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則認為中國人是從中亞來到了黃河流域，批駁了西方有關中國人在人類經歷大洪水劫難後來自西方的說法，反對用宗教來解釋科學的做法。瓦西里耶夫習慣於用批評的目光看待中國事物，而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卻寧願相信中國的一切。在將現實中國理想化方面，較俄國漢學奠基人比丘林更勝一籌。他甚至認為中國沒有階層之分，更多的是自由、平等與友愛。他讚賞中國沒有政黨的社會管理機制，建議向中國人學習他們的家庭秩序和其他生活原則。「據伊萬諾夫斯基³¹講，他寫最後兩部著作《研究中國的重要性》以及《中國人的神話觀和神話》就是為了向讀者介紹他所熱愛的中國，動搖業已形成的有關這個永遠停滯的王國的看法。」³²俄國著名旅行家普熱瓦爾斯基（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1839-1888）因為數次

成功的探險和旅行，成為當時名噪一時的人物。此人具有強烈殖民主義思想，是俄國擴張主義政策的鼓吹者。他蔑視中國人民，認為中國沒有可以稱頌的東西，叫囂用大炮和槍彈改造中國僵化的制度，送去歐洲文明的種子。當他在中國西部看到中國依然用長矛和大刀來裝備軍隊時，斷定中國不堪一擊。格奧爾基耶夫斯基起而反駁，認為中國正在對軍隊進行改組和現代化，雙方因此在報刊上展開了辯論。這場辯論「促進了俄羅斯社會更好地理解清帝國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包括如何建立按照歐洲模式訓練和武裝的新軍」，³³同時也清楚地反映了格奧爾基耶夫斯基與眾不同的中國觀。

筆者以為，格奧爾基耶夫斯基雖然是瓦西里耶夫的學生，但在他世界觀的形成階段，莫斯科大學以及東方學家彼得羅夫同樣對他產生了某種影響。在他進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時，其世界觀已經初步形成。從他寫給朋友的信中，我們看到他已經具備了對問題做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因此，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崇尚中國傳統文化和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與其說是受到瓦西里耶夫的影響，毋寧說是他獨特的求學道路和鮮明的個性使然。

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是俄國漢學史上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在俄國漢學發展的低潮時期為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滿語專業注入了活力。他冷靜思考俄國漢學的命運，首次在俄國提出漢學應是多學科總和的見解，為漢學的近代化指明了道路。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完成了數部漢學專論，向俄國民衆系統介紹了中國古代歷史、象形文字、儒家學說、神話傳說及神話觀念，發出了捍衛中國文化尊嚴、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強音，在俄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29 轉引自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Пертов Н. Н., Смыкалов Г.Ф.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ерия 2. М.: Наука, 1956.

30 轉引自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Пертов Н. Н., Смыкалов Г.Ф.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ерия 2. М.: Наука, 1956.

31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О. (1863-1903),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滿學家。

32 Хохлов А. Н.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еда //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94.

33 Хохлов А. Н.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еда //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94.